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前鋒”第二号——

陳独秀

(一)

人类經濟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殖民地的經濟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謀政治經濟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經濟权大部分操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諸本国贵族軍閥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贵族軍閥压迫之下，有产无产兩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謀經濟的独立，对内謀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軍閥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純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經濟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的資產階級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勢力，无產階級便是不用說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沒有例外。領土广大交通不便經濟組織还是地方的社会組織还是家庭的文字組織还是半象形的中国，連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断然不可怀絲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說自甲午战敗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績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階級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認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們虽未能預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長，及資產階級漸漸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經濟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階級还都紧紧的束縛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內，幼稚的資產階級，至今沒有有力的政党，便是他幼稚之征驗，他还未脫离利用敌人（列强及軍閥）勢力发展他自己階級勢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現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勢力薄弱之自然結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現，遂一口武断中国資產階級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視了。

商业工业資產階級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資產階級。他的勢力原来是依賴外国勢力（卖国）及本国貴族軍閥政府，利用国家机关（盜国）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是真正資產階級，而且是真正資產階級——工商階級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屬此类。直皖奉直兩次战争，固然是軍閥間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詒內閣，却算是扫除中国資產階級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揚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对于吳佩孚頗表同情；有人說吳佩孚打倒梁內閣是軍閥階級的胜利資產階級的失敗，这完全是夢話。

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命运。例如在欧战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倾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满了全印度的资产阶级；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货外资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阶级便渐渐有了经济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了，好象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

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

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说是希图组织商人政府，又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调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则，比起军阀军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资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

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与资本主义的高调，却一面拥戴军阀，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扑当时的暴君及贵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是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自壟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

強大的資產階級來吸收他們，只得附屬軍閥作惡，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變法自強運動，辛亥革命運動，“五四”以來國民運動，幾乎都是士的階級獨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輸入之故，旧的士的階級固然日漸退潰，而新的士的階級却已代之而興；現在及將來的國民運動，商人工人農民固然漸變為革命之主要的動力，而知識階級（即士的階級）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階級間連鎖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輕視的地位；而且在無產階級實行革命和他們階級的利益當真衝突以前，他們是羞於放弄革命態度的。最近全國學生大會，不但議決了許多國民革命的議案，並且議決了幾件為工人階級利益奮鬥的議案，這便是個明顯的例證。正因為知識階級沒有特殊的經濟基礎，遂沒有堅固不搖的階級性，所以他主觀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階級的幻象，這正是知識階級和純粹資產階級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識階級有时比資產階級易于傾向革命的緣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他們提出所謂“不合作”“農村立國”“東方文化”“新村”“無政府”“基督教救國”“教育救國”等迴避革命的口號，固然是小資產階級欲在自己腦中改造社會的幻想，然而他們對於現社會之不安不滿足，也可以說是間接促成革命的一種動力。

（五）

農民占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于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于遷徙被難苟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益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却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歷年以來，各處農民小規模的抗稅罷租運動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組織，便無人敢說連國民革命他們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見農民之疾苦而人數又如此眾多，未曾看清這只是國民革命的一大動力，以為馬上便可在農民間做共產的社會革命運動，這種觀察實在未免太

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斗争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则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觉得这种革命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

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絕緣，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脫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单纯经济斗争，没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军阀政府手里，工人经济斗争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军阀，所以经济斗争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斗争。我们更应该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斗争，只是一般的政治斗争，即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斗争，不是工人们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军阀，间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

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阶级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一）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阶级在此革命的斗争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阶级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不参加实际的行动，无论工人阶级有任何急进的主张，都不过是一个主张，实际还是站着一步不动；（四）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线，结果必是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战线，躲到经济斗争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这种脱离政治的经济斗争，必然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阶级萎靡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统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阶级强壮起来的。

或者有人以为工人阶级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便易于发生紊乱阶级和改良妥协的倾向，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其实这个想头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斗争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工人阶级只要有了独立的组织以上，只要知道一时期政治斗争的动作联合和经济斗争的主义妥协不同，勇敢的参加国民革命这种复杂的斗争，于工人阶级只有利益而决无危险。反之，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斗争之联合战线，到有上文所说的危险呵！

（七）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大群众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

的。暗杀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其結果不过报仇泄憤，决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統治階級。單靠軍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軍事投机，决不是法蘭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产业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国，尚未完全达到以整理国家为一个經濟單位的程度，地方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們應該贊成的；因为这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也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非革命的省宪运动，簡直是見鬼；因为没有革命的大群众所拥护之宪法，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于廢紙。

同时，我們也須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階級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資本帝国主义，乃建設在剝削本国工人階級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們死命的，也正是他們本国工人階級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狀況，又只是国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党人，万不可輕視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許有新的变化，工人階級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階級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資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瀕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組織。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們沒有預計的可能，也並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瀕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軍閥之重重奴辱，別的話都无从說起！

